

古典小说十讲

中 华 书 局 编 辑 部 编

古典小说十讲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小说十讲/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重印

ISBN 7-101-00858-5

I. 古… II. 中…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7298号

责任编辑: 赖 青

古典小说十讲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1/32· 7 印张· 163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8000 册 定价: 9.90 元

ISBN 7-101-00858-5/I·146

目 录

漫话《三国演义》	鲁德才(1)
漫谈《水浒传》	聂石樵(23)
神魔小说《西游记》概说	何满子(45)
《金瓶梅词话》简析	章培恒(65)
“三言”和“二拍”	宁宗一(84)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袁世硕(109)
速写画·众生相·史诗	
——读《儒林外史》随感	刘叶秋(130)
曹雪芹和《红楼梦》	周先慎(143)
李汝珍的《镜花缘》	李汉秋 胡益民(177)
封建末世的衣冠百丑图	
——读《官场现形记》	闻 起(197)

漫话《三国演义》

鲁 德 才

(一)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从奴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有许多丰富遗产留传下来,供后人研究和采择。而三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为突出的时代。鲁迅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中国小说史略》),主要指活跃在三 国政 治舞台上的曹操、刘备、孙权及其所网罗的智勇超绝之士的事迹,令人赞叹歌咏不已。因此,三国人物英雄事迹喧腾众口,自两晋经过南北朝直到隋唐,在民间口头传说中早已盛行。

记载三国历史比较完整的史书,是晋朝史官陈寿编著的《三国志》。但他见到的史料有限,所记内容过于简略,不够充实。所以,南朝宋文帝时,又由裴松之为《三国志》作了注。裴注征引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有些材料的来源就直接得自民间的传说。

民间的口头传说虽被撷取到正史,但民间对于三国故事,仍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传播下去。由于耳食相闻,辗转传述,难免不加进想像虚构的成分,结果故事内容丰富了,事迹却走样了,离历史真迹越来越远。六朝以来,就盛传关羽斩颜良的传说。在隋朝,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已有曹操谯水击鼓、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唐初在民间流传着“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而在李商隐的

《骄儿诗》中，更有这样的句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想见，诸葛亮、张飞和邓艾已成了人们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人物，足证三国故事在唐代传播十分普遍。

在宋代“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逐渐成熟的时期，三国故事很自然地成为民间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历史文献说明，宋时已经有“说三分”（即专说三国故事的一科），并且也有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其他如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都扮演三国戏。可惜宋代关于三国故事的话本和剧本没有流传下来，无以知道它们的内容；但照宋代说三国故事的情形看，无疑是相当丰富而精采的。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国故事话本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单从故事情节看，总算把纷纭万端的三国事迹组成了首尾完整的故事，已具粗略的间架，但叙写简单粗糙，属入了一些不符史实的杜撰，可能是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底本。当时类似这样的话本不止一种。元王圻《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回首《三分书》里事，区区缚虎笑刘郎。”（《伊宾集》卷五、卷七）诗里提到的情节不见于《平话》和《三分事略》，可能出于另外一种讲史。

金元之际，院本杂剧盛行，三国故事也被大量地搬上舞台。据元钟嗣成《录鬼簿》等书著录，元人杂剧剧目，就有近五十种是三国戏。

元末明初的作家罗贯中，就是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并结合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最后编纂了《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因为罗贯中的成就，造成读者对三国故事更热烈的喜爱，于是刻本甚多，流布甚广。今所见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

国志通俗演义》。这大约是最接近罗贯中原著的一本。在弘治本以后直到明末，三国演义的新刊本越来越多，不下二十余种，不过做了些插图、评点、文字上的增删，以及卷教和回目上的整理工作，对弘治本的内容，却均未曾改动。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仿金圣叹评改《水浒》，假托“古本”，就明刊本加以增删润饰，改订回目，并逐回评论，这就是如今通行的、标明为“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

（二）

《三国演义》前八十回主要描写东汉王朝的崩溃，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和魏、蜀、吴鼎立局面的形成；后四十回主要描写三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以及三国统一的历史。从全书的轮廓、线索和人物的主要活动看，大体同历史相去不远。但是，《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演义小说，就小说表现的主要思想内容而言，作者是借用充满激烈斗争的三国故事，通过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悲剧，描写了封建社会分裂与统一过程，揭示地主阶级各类代表人物在镇压了黄巾起义之后，怎样争得统治权和丧失统治权的经验教训。具体一点说，谁善于发现、尊重和使用人材，善于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处理诸种矛盾关系，实行所谓爱民的仁政，并且有承继父兄事业的英明君主，谁就能夺得霸权，巩固住政权。为了争得霸主地位，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使尽了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谋略，总之是调动了一切斗争形式，甚至连家庭、朋友、婚姻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都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服从斗争的需要，成为斗争的工具。作者写的是三国，但他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已不限于三国一个时代，而是概括和熔铸了长时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

权的历史内容，提出的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不回避由于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而致使“朝政愈坏，人民怨嗟”，激起了黄巾起义的历史事实，多少透露了当时一些历史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有些章节里，描绘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苦人民的黑暗情景。如第四回写董卓杀良冒功，“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如第六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更是纵兵殃民，结果洛阳化为一片焦土。而那些免于屠刀之下的人民，也由于统治者连年战争和生产的荒废，或冻饿而死，或挣扎于死亡的边缘。如第十三回写“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四回写“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等等，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的凶恶面目，看出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的背后隐藏着人民的辛酸血泪。尽管如此，但作者描写农民起义，不过是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点出社会分化动荡的原因。由于张角起义才引出了小说的两个中心人物刘备与曹操，这两个人物又引带出了袁绍、董卓、吕布等各方势力。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头面人物，自然和农民革命军尖锐对立，毫无疑问要联合起来镇压黄巾军起义。地主阶级的联合阵线打败了农民起义军之后，阶级斗争的形势陡然一变，各派在维护正统、复兴汉家的旗帜下，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斗争。所以，作者不理解也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农民革命斗争根本不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而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则是《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

罗贯中沿着三国斗争的历史发展，忠实地描写了群雄争霸的过程。概括说来，作者写了三次争霸阶段：董卓专权到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群雄争霸；赤壁之战中的三雄争霸；以及三分天下

之后三国政权的中兴与没落。每一次争霸过程都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意念，显示出不同的思想内容。

(三)

黄巾大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如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孙坚、孙权、刘备、刘表、吕布等等，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拥兵自立，称雄各地。他们各有幌子，作为护身符；各持旗号，以招揽时人。但是他们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称得起当世英雄，争得到霸主的地位，而必须具备做霸主的条件。罗贯中写了那么多人物，目的就是要通过真实的形象，告诉人们在群雄争霸时期，哪种人是忠是正，哪种人是奸是邪；哪种人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哪种人却站住了阵脚。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罗贯中写出了群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争霸，又为什么能够争得或者不能争得霸主地位的悲喜剧。

在群雄中，董卓不用说，那是个凶暴粗野的军阀，有武无文，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能起破坏作用，而无益于社会。

那么，人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吕布，能争得霸主地位吗？也不能。吕布为了一匹千里马与几颗明珠就可以被收买杀丁原而依附董卓；为了夺得貂蝉又可以杀董卓转向新主子王允；而在被曹操困守下邳的危急时刻，犹豫不决，不肯听从陈宫提出之分兵两路与操周旋，或引精兵猛将断绝曹操粮道以解下邳之围的计策，反而是恋妻妾如明珠，视将士如草芥，因小而失大，终因失去了突围机会而殒命。《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形象，不只是历史上吕布的写照，而且是集中了封建社会那般有奶便是娘的帮凶们的特点。这类人见利忘义，反覆无常，如恶犬饿虎，饥则噬人，饱则离去。即使

他们拥兵自立，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目标，固定的盟友，无论哪一个政治集团都“恶其反覆，拒而不受”，所以他们只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

作者写袁绍，也集中写他为什么不可能争得霸主的地位。提起袁绍人们立刻想起他常常把“四世五公”的出身挂在嘴巴上，想到郭嘉对曹操与袁绍十胜十败的评论。在群雄争霸时，袁绍豪门贵族的社会地位，门生故吏遍天下可为羽翼的社会影响，坐拥重兵的势力，比任何一个争霸对手都硬梆。然而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中原霸主的袁绍，却遭到了可悲的命运。原因何在呢？郭嘉月旦臧否，固然有对曹操面谀之嫌，但不能不承认郭嘉道出了袁绍的致命弱点，其中特别是外宽内忌的为人。罗贯中正是抓住袁绍这个性格特点，虚构了“温酒斩华雄”的情节，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类人的悲剧。通过这个情节，一方面烘托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袁绍偏狭的性格。关羽顷刻间轻取华雄，破敌解围，理应把酒相庆，立功者赏，但是袁氏兄弟轻贱了这位“弓马手”，竟要把关羽赶出帐去。这就预示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因为虚怀若谷，延揽人材，是争霸者的必备品格。袁绍没有这样的品格，一败涂地，就在所难免。这不但导致十八路诸侯联盟的破裂，也决定着以后官渡之战的失败。而在写官渡之战时，罗贯中特别着重刻划袁绍“有才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外宽内忌的性格。袁绍初起兵，向官渡进发，谋士田丰就上言劝阻。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大怒，要斩田丰。军行至阳武，沮授也提出：北军（袁军）勇猛不如南军（曹军），南军粮草不如北军，南军无粮，利在速战，北军有靠，宜且缓守。这个正确主张，却被袁绍认作是“慢我军心”，也把沮授锁禁军中。这样袁绍固执己见的悲剧性格又被揭示了一层。这还不够，此后，待到曹操军粮缺乏，意欲弃官渡，回许昌，迟疑未决之时，许攸向袁绍建议分一路军攻许昌，因此时曹军主力集中官渡，许昌空虚，如分兵两路

夹击，必然败操。许攸献策却遭到了袁绍的拒绝，而且还怀疑许攸与曹操有旧，受操贿赂，充当内奸，竟然要斩许攸。这一切都表明，袁绍心地狭窄，又倨傲自专，放不下贵族的架子，谋士们的谏诤深深伤害了他高贵的名分，简直不能冷静地吸收他们的意见，疑所不当疑，又信所不当信，终于一战白马颜良死，二战延津文丑亡，至三败官渡，三十万大军止存八百余骑，许攸、张郃归降曹操，沮授拒降而自杀。袁绍落得个孤家寡人，被曹操踢出了历史舞台。

古代史学家们评价三国人物往往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是成功与否，到底自有其优劣得失在。孙坚、吕布、袁术、袁绍之辈，包括号称“江夏八俊”而为曹操斥为守门之犬的刘表之流，显然都不是可成霸主，称得起当世英雄的人物。用曹操的话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

（四）

曹操与刘备显然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去夺取霸主地位；尽管罗贯中不见得同意曹操的人生哲学，曹操的为人，甚至在某些方面丑化了曹操，但作者却承认，只有曹操和刘备这两类英雄人物才能夺得天下。历史上的曹操，按陈寿《三国志》的观点，是理应得到天下，因为他是个英雄；小说中的曹操，按罗贯中的观点，也是能争得天下的，因为他是个奸雄。曹操与刘备，代表着地主阶级的两个英雄夺取霸权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靠“仁义”起家成就了霸业；一条是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道路，扫平群雄，独居中原，也成就了霸业。因此罗贯中既不是把曹操当做天生的大坏蛋，也不是像陈寿那样过分美化曹操，而是把曹操做为既奸又雄的典型来写，写出了曹操的复杂性格。

从《三国演义》的描写来看，作者并没有掩盖曹操善于发现人

材，使用人材的政治家风度。历史上的曹操以知人善用著称。司马光说他“识拔英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罗贯中虚构“温酒斩华雄”的情节，这何尝不是用对比的手法，揭示曹操慧眼识英雄，重视关羽、刘备的才能，反对袁氏兄弟重职位，轻人材的世家大族的偏见，主张“得功者赏，何计贵贱”的思想呢？

小说在关羽五关斩将一节里，把曹操爱才的政治家风度表露得更为明显。《三国志·关羽传》说：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这些记述，不言而喻，有陈寿的誉美之词，但确也表现了曹操的风度，就连并不以曹魏为正统的裴松之，也不得不承认曹操“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史书中的上述情节。罗贯中撷取到小说中来，其主要部分与中心思想，差不多没有加以任何修改，仍旧保存着几个主要环节；不过罗贯中设置的关羽过五关的情节，既丰富了关羽义的品质，也突出了曹操爱才的政治家风度。关羽为了追随刘备而挂印封金，斩关夺路千里独行，这在关羽是“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兄弟加君臣关系的忠义；在曹操，则看重的是“事主不可移其志”、“来去明白”的忠义品格和光明磊落的作风。所以，当关羽离去，曹操部下皆忿忿然，欲追杀时，曹操不但力排众议，放走关羽，还赠袍、赐金、送马，而且亲自为关羽送行。曹操何以如此呢？清人毛宗岗说这是曹操老贼的奸诈。这显然是把曹操看作心怀忌刻的袁绍，而不是英雄盖世的政治家。其实曹操明明知道送走关羽是放虎归山，给他潜在的也是未来主要争霸对手刘

备增加一员虎将，但是关羽义贯千古的品德，不能不使他敬佩。要知道，对“天下义士”的敬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啊！倘若曹操真的追而杀之，他就会失信于天下，就不成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就会在群雄争斗中失去人心。再者，曹操敬重关羽“事主不忘其主”的品格，正是借此来激励他的部下，忠于争霸事业。当然，曹操放走关羽的行动，不能不引起很讲义气的关羽思想上的震动，从而达到了笼络关羽的目的。

曹操不念旧恶，有气度非凡的故事，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像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曹操清楚地知道刘备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但并未依照部属们意见，清除刘备以绝后患，而是始终以诚相待，来去自由。曹操这种以争霸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为重，“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的政治家风度，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争霸者都具备的。

这种不念旧恶的事例不只是对待刘备、关羽，对内部发生的离心事件的处理也是如此。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之后，缴获了许昌和军中许多人与袁绍暗通消息的信件，左右人提议逐一点对姓名抓起来杀掉，但曹操不同意，他认为“当袁绍强大时，连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是别人呢？”当着众人的面把信烧掉了。这并不完全是曹操的奸诈行为，倒是表现了一个有抱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善于不论在困难时还是在胜利时都节制自己的感情、宽宏大忍的风度。应当承认，曹操不愧为第一流政治家。也正因为曹操知人善任，有政治远见，才赢得许多文官武将如典韦、许褚为他舍生救命，郭嘉、荀彧为他披肝沥胆，呈现文武如云，共图进取的兴盛局面。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曹操，还是意志坚决，思虑周密，勇于进取的军事统帅。罗贯中描写了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满朝公卿谈虎变色，曹操竟毛遂自荐，谋刺董卓。这谋刺的行为虽然鲁莽而不能不失败，但从这已看出曹操不同凡俗的敢做敢为的精神。特别是曹

操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斩吕布败袁绍，扫荡群雄，统一中原，都是他亲自“运筹演谋”，甚至“披坚执锐”督战的结果。即使是曹操打了败仗，像乌林遇赵云，葫芦口逢张飞，华容道会关羽，都险些丧命、狼狈到极点的时候，有谁能刚刚脱险、惊魂未定时，反而大笑对手设伏不周呢？有谁能像曹操那样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呢？

自然，曹操并不是一个超阶级的历史人物，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在他身上有着集中的表现。小说在描写曹操“雄”的一面同时，又较多地描写了他“奸”的一面。

曹操这个人非常狠毒残忍，杀吕伯奢全家即是一例。曹操刺卓不成，仓皇出走，路过吕家，吕伯奢匆匆去沽酒，准备款待曹操。操忽闻庄后磨刀声，误以为图己，又疑吕伯奢出门去告发，于是动了杀机，杀了吕伯奢全家，又杀吕伯奢本人。陈宫指责曹操“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里，罗贯中一方面写出了曹操在什么样情况下杀吕伯奢和全家；另一方面，点出了曹操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思想支配下杀吕伯奢及其全家的。从汉末群雄并起，争夺霸主地位的情况看，曹操是非杀吕伯奢不可的。因为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奉行的本来就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假如曹操没有这种损人利己的处世哲学，那他就混不下去，不但可能击败对手，而且早就做了董卓的刀下鬼了。“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问题是曹操不同于一般的好者，他似乎比别的恶人更奸险，更毒辣，因为由疑而错杀一家就已恶甚，但曹操却一不作，二不休，骗得吕伯奢回头，一剑又将他杀死，免除被追踪的威胁，并且杀了自己父亲的好友之后，一点恻怍都没有，这是大奸大恶者的特征。

如果说杀吕伯奢时，曹操还是个落难豪杰，在董卓捉拿甚紧的情况下，不得不下此毒手，表现了曹操自私狠毒的话，那么曹操升为丞相，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之后，杀人也杀得很狡诈，

很不光明磊落，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他的狠毒，他的“奸”的一面，比如借人头杀粮官王垕，阴险毒辣真是可怕极了！而他预谋杀人这一手真是叫绝！既平息了众怒，稳定了队伍，又推卸自己主帅的干系，保护了自己的声誉，待到他自己犯军纪，则就割发代首了。罗贯中真是把曹操的奸诈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曹操奸诈到让人猜不透，所以他不喜欢别人猜出他的心思，更不喜欢人们揭穿他想些什么。杨修被杀就是如此。史传上说杨修的言行不合礼教，又联结诸侯，特别是支持曹植向曹丕夺权而被杀（事见《三国志·曹植传》注引《典略》）。这在小说里，变成次要原因，杨修揭穿曹操心迹，才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如七十二回曹操夺取汉中失利，进退两难，杨修从曹操下的“鸡肋”口令猜出丞相有退兵之意；又如杨修说出曹操所谓梦中杀人的本相，等等。这都说明惯于耍手腕的人，是讨厌别人揭穿他的欺骗阴谋、甚至怕人知道他是英雄。至于徐州屠城、杀伏后、害华佗、荀彧被逼自杀等等，都典型而又集中地暴露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丑恶本质。正因如此，曹操才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朽的反面形象。

（五）

另一个“天下英雄”——刘备，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历史条件下，罗贯中很有可能借助刘备的形象，寄托着他的理想：三国的刘备未能统一天下，而元末动乱的天下，应当由刘备式的人物来统一。三国时期，刘备图王兴霸，比起同辈人来说，条件最不利。虽说占了汉家姓氏的便宜，但是，贩履织席的身份却很难洗刷干净。他既没有曹操独居中原的地位，也没有孙权承继父兄基业的优势，而始终处在寄人篱下，风雨飘摇之中。既要战胜强大的对手，又要获取舆论的支持，除了打着刘家大旗之外，重要

的是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时人崇拜的偶像，同时还要有网罗崇拜者的思想口号。在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统治阶级内部残酷狠毒，荒淫无耻，不讲信义的情况下，刘备向人们宣传仁义思想，乃是收罗依附者的一种得人心的手段。刘备说得明白：“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刘备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第十九回刘备小沛一战，被曹操和吕布夹击，匹马落荒逃走，难中绝粮遇猎户刘安，刘安一时找不到野味，竟杀妻供食，可见其仁义影响是很深入人心的。

刘备和曹操，在作者看来，代表着两个英雄人物夺取霸权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他在小说中突出两种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哲学，而作者的倾向，毫无疑问是倾注在刘备身上。从性格对比的意义来说，曹操为了报父仇进攻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十回）而刘备宁肯打败仗而不愿丢却跟随他的难民（第四十一回）；曹操能无故杀故交吕伯奢、孔融等人，而刘备和关羽张飞却是“誓共生死”；曹操能因道破他的奸诈而杀杨修，刘备却三顾茅庐请孔明……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细节，显然是作者有意刻划曹操和刘备在政治倾向上、道德品质及心理素质上的对立，从而歌颂刘备“弘毅宽厚”的品德，树起一个理想化了的“圣君”的形象。

作为艺术形象，罗贯中美化刘备的宽厚，对照奸狡凶残的曹操，不能说毫无历史根据，但是作者的再创造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事实，在一切方面都夸张拔高了刘备的性格，处处表现他以仁义而得人心，如第三十五回徐庶向刘备说民间歌谣中对他的评价：“吾自颖上来此，闻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使君之仁德及人也。”司马德操说得更明确：“‘天命有归’，‘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好像刘备是天下的英主，未来的天下必然是为刘备所属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引伸、扩展、虚构了许多情节，直接描写刘备仁厚待人的精神和行为，如刘玄德携民渡江的场面

就写得激动人心，而“三顾茅庐”，更表现了刘备礼贤下士的风度。

当然，《三国演义》写刘备，正如鲁迅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在群雄争霸时期，刘备同样有政治野心，同样企图吞并其他割据势力，攫取霸权，而为了追求霸主地位，同样要玩弄政治手腕。刘备在赵云面前掷阿斗于地，弥留时叫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未必都是真心话。可是刘备毕竟比曹操更深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道理，所以刘备虽不如曹操那样“三十余年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也没有曹操“横槊赋诗”的才气，但是不轻易许人的诸葛亮和五虎将，却甘愿为刘备事业毕其一生，倘若没有刘备的知人善任，折节下士，取信于天下，恐怕不会得到他们忠心辅佐，使他由织席贩履的微贱地位，而进入群雄角逐的行列，终得四川而为汉中王，为昭烈帝的。

（六）

曹操扫平了北方群雄以后，即调转矛头，挥师南下，击破了刘琮的荆州水师，占据江陵，企图一举消灭刘备和孙权的势力，进而席卷南方，一统天下。此时此刻，不仅刘备面临着被吞灭的危险，就连静坐观望成败的孙权也感到战火烧身，再也观望不下去了。摆在刘备和孙权面前的只是两条路：要么降曹，要么联合抗曹。这样群雄争霸演化成了三雄争霸，经过赤壁一战，终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段历史时间不长，但却极其错综复杂，有曹操同孙、刘的矛盾，有孙刘两家之间的矛盾，在孙权内部也有主降派与主战派的矛盾。面对这头绪繁杂的矛盾线索，罗贯中选定以周瑜和诸葛亮的冲突作为情节的磁力线，来联结两个集团的矛盾：一方面反映曹操和孙刘联盟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反映孙权和刘备